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三十六辑(2012年第2期)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黄少安 / 主编

动物忠诚、行为认同与本地偏好：范式调和与理论模型

刘寅 李宝仁

合约时间

付才辉 林民书

制度转型中的个体知识与策略认知：自治还是依赖政府？

章平 黄凯南

产权管制范式

何一鸣 罗必良

文化是决定的还是被决定的——以江西省余江县中童镇的产业文化变迁为例

李建德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苏春红 田坤忠

语言服务的价值与效益——以南京语言服务调查为例

李现乐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三十六辑 (2012 年第 2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三十六辑 (2012 年第 2 期)/黄少安主编.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41 - 2420 - 0

I. ①制… II. ①黄… III. ①新制度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91. 34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5776 号

责任编辑: 柳 敏 张庆杰
责任校对: 康晓川 杨 海
版式设计: 代小卫
责任印制: 邱 天

制度经济学研究

总第三十六辑 (2012 年第 2 期)

黄少安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37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汉德鼎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华玉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3.5 印张 270000 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2420 - 0 定价: 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制度经济学研究

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主 编	黄少安
学术委员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茅于軾	中国社会科学院
盛 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张 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邹恒甫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编辑部主任	李增刚
主 办 单 位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目 录

动物忠诚、行为认同与本地偏好：范式调和与 理论模型	刘 寅 李宝仁 (1)
合约时间	付才辉 林民书 (24)
文化符号、进化心理与合作秩序	李永东 (57)
奈特不确定性下企业家创新的微观决策 ——基于四种公理化模型的比较分析	吉 云 姚洪心 (73)
制度转型中的个体知识与策略认知：自治还是依赖政府 ——以住宅小区集体物品供给为例	章 平 黄凯南 (97)
产权管制范式	何一鸣 罗必良 (111)
文化是决定的还是被决定的 ——以江西省余江县中童镇的产业文化变迁为例	李建德 (126)
皇权专制和国家审计：一个制度变迁理论架构	郑石桥 (140)

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微观数据的

研究 苏春红 田坤忠 (160)

语言服务的价值与效益

——以南京语言服务调查为例 李现乐 (172)

柯兹纳论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刘业进 朱海就 (187)

家庭结构、制度和增长：西方自治组织的

起源和含义 [美] 阿夫纳·格雷夫 杨依山译 张清津校 (201)

后记 (207)

CONTENTS

Animal Loyalty, Investor Behavior Identity and Home Bias: Paradigm Reconciliation and Theoretical Model	Liu Yin Li Baoren (1)
The Time of Contract	Fu Caihui Lin Minshu (24)
Cultural Symbols, Evolution Psychology and Cooperation Order	Li Yongdong (57)
On the Micro Decision Making of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under Knightian Uncertainty—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Four Axiomatic Models	Ji Yun Yao Hongxin (73)
Individual Knowledge and Strategic Cognition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Self-governance or Government Provision—Taking the Common Pool Resource in Residence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Zhang Ping Huang Kainan (97)
The Paradigm of Property Rights Regulation	He Yiming Luo Biliang (111)
Culture, Determines or is Determined? —a Case Study of Industrial Culture Changeat Zhongtong Town, Yujia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Li Jiande (126)
Imperial Autocracy and National Audit: a Theory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Zheng Shiqiao (140)
Impacts of the NCMS on the Health of Rural Residents—Based on Micro Data of CHNS	Su Chunhong Tian Kunzhong (160)

The Value and Benefit of Language Services—Take an Example from the Study of Nanjing Language Services	Li Xianle (172)
Kirzner on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Liu Yejin Zhu Haijiu (187)
Family Structure,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The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of Western Corporations	Avner Greif (201)
Postscript	(207)

动物忠诚、行为认同与本地偏好： 范式调和与理论模型^{*}

► 刘 寅 李宝仁^{**} ◀

【摘 要】 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参与主体，其认知与行为直接影响到自身的投资决策及由此产生的若干投资现象，而投资本地偏好现象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尝试从认知科学和复杂科学等视角给出投资者行为认同这一概念，从微观投资者角度结合新概念建立了一个均值一方差框架下的本地偏好理论模型，理论上证明了投资本地偏好现象同在投资者行为认知特性下个体对待资产的价格成本认知和风险认知有关，究其原因可追溯到人类个体特有的动物理性忠诚属性，由此也提供了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中出现投资本地偏好现象的微观及中观基础。同时，以动物理性忠诚为基础从理论层面努力尝试否定并调和经济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完全均衡与完全演化范式。

【关键词】 动物忠诚 行为认同 本地偏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化投资趋势及各国金融市场

^{*} 作者感谢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平教授，赫特福德大学商学院 Geoffrey Hodgson 教授，剑桥大学经济系 Tony Lawson 教授，赫尔辛基大学社会科学历史系 Matti Peltonen 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凯南教授，昆士兰大学经济系 Paul Frijters 教授，昆士兰科技大学经济与金融系 Uwe Dul-leck 教授，伦敦大学学院经济系 Kenneth Binmore 教授，北京工商大学孙凤仪教授、田建华博士的交流；感谢耶鲁大学 Robert Shiller 教授对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启发；感谢 2011 年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评阅人和听众的交流和有益讨论。作者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若干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 刘寅，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地址：（100048）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3 号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E-mail: Lorentz1108@yahoo.com.cn。李宝仁，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地址：（100048）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33 号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E-mail: Libaoren12@yahoo.com.cn。

联动性的增强,提供给各国投资者进行资产多样化选择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多;同时,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也认为,通过构造包含各种不同投资资产的投资组合可以有效降低投资的非系统风险进而获得分散化投资收益^①。但是,根据经典投资组合理论获得的资产投资组合理论比例值却很难在经验数据中得到验证和支持,如刘易斯(Lewis, 1999)对美国投资者1970~1996年间的投资组合比例进行理论测算,认为最小方差组合的投资比例应是投资者持有约40%的国外资产,但实际的经验证据表明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外国资产比例却不到10%;不仅在美国存在这种与理论投资组合比例相悖的现象,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及瑞典等国家均存在低于理论比例的情况^②。我国学者韩立岩等(2008)对银行股票投资偏向进行考察也发现中国及巴西、波兰等发展中国家存在较高的国内投资偏向值,而外国投资偏向较低。从经验数据中观察到的这种投资者对非本地资产投资比例远低于对本地资产投资比例的现象被称为投资的本地偏好现象。

二、文献综述

现有对投资本地偏好现象的有力解释,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两个维度:一个是从投资过程产生的交易成本和为防范投资过程出现的投资风险入手,即从投资的成本—风险角度进行解释;另一个是集中于从投资的信息获得—认知角度进行解释。

(一) 投资的成本——风险角度

投资成本方面早期以布莱克(Black, 1974)和斯图尔兹(Stulz, 1981a, 1981b)为代表认为存在本地偏好的原因是从价税及有关国际资本市场贸易壁垒所产生的投资成本。刘易斯(1995, 1999)认为在欠发达国家

① 以往文献如 Grubel (1968), Levy 和 Sarnat (1970), Solnik (1974), Eldor, Pines 和 Schwartz (1988), DeSantis 和 Gerard (1997), Chan, Covrig 和 Ng (2005), Barron 和 Ni (2008) 等均强调了国际资产组合多样化和分散化对降低投资风险及稳定收益的益处。

② 如 French 和 Poterba (1990, 1991) 证实美国本地的投资者对外国资产的投资比例仅为 6%; Cooper 和 Kaplanis (1994) 得出的比例更低, 仅为 2%; Tesar 和 Werner (1992, 1994, 1995) 以及 Ahearn 等 (2004)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际方面, 以 Cooper 和 Kaplanis (1994) 的研究为代表, 得出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及瑞典的国内投资者对本国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分别为: 86.7%、78.5%、64.4%、91.0%、75.4% 和 100%。

和地区由于可能存在的国际税因素及政府对投资资本流动的严格管制,进而出现高比例本地投资现象。已有的大量经验证据也支持了这一解释,交易成本壁垒与相应的政府管制对资产投资的本地偏好起显著作用 (Errunza & Losq, 1985; Bonser-Neal et al., 1990; Obstfeld & Rogoff, 2000; Serrat, 2002; Anderson & Van Wincoop, 2003); 但近期的一些研究也得出了交易成本并不会引起投资组合本地资产偏好的结果 (Baxter et al., 1998; Pesenti & Van Wincoop, 2002; Coeurdacier, 2009; Van Wincoop & Warnock, 2010)。造成结论各异的原因,一是由于研究文献多采用一般均衡的方法考察交易成本与投资组合本地偏好,研究者在设定一般均衡模型结构和假定时产生了较大的随意性;二是较少地考虑了在实证中选用的如汇率及资产收益等变量随机性与一般均衡框架的匹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近期代表性的文献如恩格尔和松本 (Engle & Matsumoto, 2009) 及范·温库普和沃诺克 (Van Wincoop & Warnock, 2010) 考虑了在给定汇率及资产收益的一般均衡下通过解出局部均衡投资组合并结合均值方差框架导出的方差比率来测度本地偏好。另外,还有学者如特萨和维尔纳 (Tesar & Werner, 1995)、沃诺克 (2002) 认为由交易壁垒出现的成本会引起相关资产换手率降低,进而认为换手率指标与国外资产投资比例存在关系,但从实证角度未获得支持。我国学者行伟波和李善同 (2009) 利用中国省际产品贸易和缴纳增值税情况的数据,通过构造边界效应模型对我国省际贸易的本地偏好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模型设定得出我国省际产品贸易存在显著的本地偏好。

投资风险方面,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汇率风险。风险可以看做产生投资成本的一个因素,所以其经常与交易成本因素一起考虑建立一般均衡模型 (恩格尔和松本, 2009; 范·温库普和沃诺克, 2010)。早期研究者如库伯和卡普兰尼斯 (Cooper & Kaplanis, 1994)、刘易斯 (1999) 等提出投资者热衷投资本地资产可能由于本地资产投资保护了本国投资者利益,这种保护机制对防范投资风险会产生重要意义。但实证结果对此却无法给出满意的回答,经验数据表明本地资产投资对防范汇率风险的作用并不显著 (Adler & Dumas, 1983; Cooper & Kaplanis, 1994; Vassalou, 2000)。皮赞提和范·温库普 (Pesenti & Van Wincoop, 2002) 通过建立给定的资产收益及零交易成本的局部一般均衡投资组合最大化模型并针对非交易类商品研究规避汇率风险与本地偏好问题,发现仅存在微小的本地偏好现象。

(二) 投资的信息获得——认知角度

对本地偏好的另一个有力解释是信息差异。巴隆和尼 (Barron & Ni,

2008)对早期的理性预期模型进行修正并构建了基于不同初始投资组合规模和内生信息获得途径的理性预期模型,认为投资组合规模大小会显著影响到本地偏好形成,在内生的信息获得成本增加情况下,本地偏好现象会显著增加;埃里希等(Ehrlich et al., 2010)也针对内生的信息获得,结合人力资本禀赋探讨本地偏好问题,通过构建具有特殊与一般的两种不同人力资本禀赋假设,由信息获得产生的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发现了不同投资者的本地偏好。阿赫纳(Ahearne, 2004)的研究发现交叉上市的标的资产对降低非对称信息进而降低投资者对其进行的本地偏好投资有直接意义。从距离感和熟悉性产生信息优势的角度,经典文献如康和斯图尔兹(Kang & Stulz, 1997)对投资于日本的外国投资者进行研究,发现外国投资者主要偏好对其熟悉的日本本土公司进行投资,即使所获收益低于对其他公司的投资收益,表明投资者的这种熟悉性,可以产生投资行为偏差进而导致本地偏好产生。科维尔和莫斯科维茨(Coval & Moskowitz, 1999)解释了总部位于美国本土的公司会受美国投资者的偏爱进而在投资组合决策中使得对本土企业投资的比例更大。格里布拉特和科律哈尤(Grinblatt & Keloharju, 2001)发现投资者偏好于对用母语进行交流且公司首席执行官具有本国文化背景的本地公司股票进行持有和买卖。如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考虑,投资者的认知心理对其投资行为和投资决策常带来系统性影响,特沃斯基和卡尼曼(Tversky & Kahneman, 1986)的经典文献表明个体偏好会受框架效应作用,个体偏好不会脱离周围的决策环境单独存在,在决策背景、环境与个体偏好互动的过程中,背景与环境的变化将导致偏好改变,由此也为存在投资的信息获得差异提供了认知心理学依据。另外,考尔(Kho)、斯图尔兹和沃诺克(2008)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产生投资本地偏好的原因可以从最优公司所有权理论(Optimal Corporate Ownership Theory)进行解释,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性,可能使公司内部拥有绝对监管力的国内大股东“所有”公司,进而降低了国外投资者的流入能力,导致本地偏好产生,由此还提出了本地偏好的最优公司所有权理论。毕格斯蒂卡和弗兰斯(Beugelsdijk & Frijns, 2010)还从文化的信息性角度解释了国际资产配置中资本比例偏差现象,发现社会文化与不同资本市场所处的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对资本投资比例存在显著影响,国家个人主义会使投资于外国资产的比例较大。对这一角度的研究近期还集中于投资的地缘优势、投资者对投资资产熟悉程度、社区居民追随投资及社区家庭相互影响投资信息等方面(Coal & Moskowitz, 2001; Ivković & Weisbenner, 2005; Malloy, 2005; Hong, Kubik & Stein, 2004; Brown et al., 2008; Dupuy et al., 2010; Coeurdacier & Guibaud, 2011)。

（三）本文的研究目的与逻辑

从对本地偏好现象及其研究的文献综述出发考虑现有对投资本地偏好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力度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虽然研究视角可以从一些侧面如较宏观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较微观的信息差异或从“人文”角度对本地偏好做出一个描述，但以往研究更多的是展现出对本地偏好现象的“片断”与“细节”描述，对现象背后的深刻性把握比较乏力，缺乏审视视角之间的必要联系与相互融合。如果能够继续深入反思，纵观历史上经济流派的兴衰与论争，长期以来主要的经济研究范式存在着对人类个体的本真性的否定而造成个体行为认知在经济现象中的根本忽略。本文对长期存在的这样一种忽略个体本真的局面感到担忧，长期以来对经济研究主要范式的过度依赖和对所谓主流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的盲目崇拜是造成视角单一、片面、狭隘，束缚研究视野难以拓展，制约理论创新的一个根源。本文所做研究目的之一，也即尝试突破现有对本地偏好现象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从一个新的、综合的视角切入，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通过努力调和目前均衡与演化两大经济分析范式的对立观点与矛盾局面，进而尝试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思路，以观察入手，把现象作为研究起点，重视实在的相互作用，力图使对本地偏好问题的“问基”与“拓边”成为可能，尝试构建起一个具有解释力和包容性的本地偏好理论框架。本研究的逻辑框架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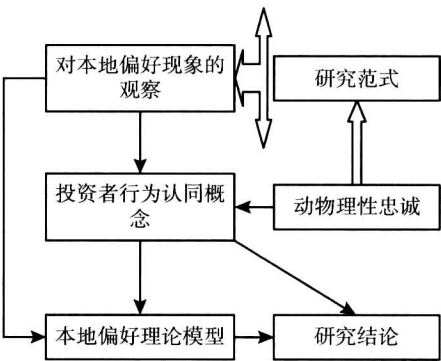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的逻辑框架

三、概念的提出

如果从投资者认知及行为层面考虑，本文尝试提出投资者行为认同的概

念,并考虑将以往从各种角度对本地偏好的研究文献尝试均纳入投资者行为认同的概念框架内进行分析。另外,由于投资行为现象存在的普遍联系和内在复杂性,对于行为金融领域研究投资者过度自信、内生异质信念、损失厌恶、投资者时尚与从众等若干现象,投资者行为认同概念可能能够提供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解释。

(一) 内涵及外延

投资者行为认同是基于经济个体(投资者)具备动物忠诚属性提出的。动物忠诚与凯恩斯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不同,动物精神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活动中参与者的非理性因素与非确定结果,但动物忠诚不仅包含非理性行为,还包含传统意义上的理性特征,是一种对人类个体的现象的描述。由动物忠诚产生的行为不一定导致非理性行为,行为结果也并不全是非理性结果;哲学上动物忠诚可以追溯到柏格森(Bergson)倡导的生命冲动、绵延和直觉主义;艺术领域可以从印象派绘画代表人物莫奈(Monet)和印象主义音乐开创者德彪西(Debussy)等人的作品中寻找灵感;社会人类学中类似于民族中心主义的论调也可以为此提供依据^①;由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的视角,从个体脑的演化也不难寻找到动物理性忠诚的生物基础与合理性^②。对经济个体而言,动物忠诚代表了人类特有的动物理性忠诚,其涵盖了认知理性与动物精神,能够反映和解释具有行为能力的个体所具备的可能行为特征的原因。

1. 认知理性与范式调和

具体而言,一方面,如果考虑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的理性二分法,如哈耶克(Hayek)、韦伯(Weber)、西蒙(Simon)等学者把理性划归为构建理性与演化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完备理性与有限理性等,这种划分也表明了经济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的均衡和演化观念,分别意味着研究范式的唯理性、机械性、非历史性、静态性,以及生物性、文化性、历史性、演化性等。如果以此二分研究范式的观念来观察经济学流派的演进思路,则分别发展出目前所谓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

① 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体现出民族文化主体的一种主观倾向,一些时候认为自身存在着某种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特质;从外部来看,往往可能过度放大了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而产生对主体文化的偏执或狂热。

② 如果考虑个体脑演化的进程,简单来讲,伴随着从负责新陈代谢等基本机能的脑干,到负责情绪、情感与直觉的所谓哺乳动物型脑,再到负责抽象思维与意识活动的大脑皮层的演化顺序,大致能够将人类的非理性与理性进行物理区别;因而从整体论上,是一个复杂机制,从这个意义上实质给出了人类动物理性忠诚的生物基础。

济学等；以及非主流的演化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老制度学派等。对于理性的这种二分认识，波登（Boudon, 1998）提出认知理性的新概念来调和理性二分法并深化了理性的定义与内涵；国内有代表性的文献如黄凯南和程臻宇（2008）又对认知理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在关注个体的生物与结构、过程与交流、整合与适应的基础上从认知科学的视角给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认知理性定义，即拥有完整生物神经结构的个体通过生物调节过程、个体学习过程和社会学习过程等各种层次的认知过程，建立应对外界环境刺激的稳定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能够促使个体有效地处理各种有关内部机能和外部环境的能量、信息和知识，提高个体在各种演化环境中的适应性（黄凯南、程臻宇，2008）。同时给出了符合个体认知理性的具备条件的论述，包括：（1）行为个体拥有完整生物神经结构；（2）个体行为具备稳定与重复的特征；（3）个体行为能够产生节省认知资源的效能；（4）个体行动应满足演化的适应特征；（5）个体行动可以具备非最大化演化适应特征（异质下的次优）。

由认知理性的认知过程与演化适应特征反窥理性二分法下经济研究的均衡和演化范式，可以发现一般所谓的均衡观与演化观其实质均是超越理性或实质理性的个人选择与自然选择，赋予了个体或自然无穷力量：均衡观将理性诉诸无所不能的个体及个体选择，个体具有无限意识，而个体选择则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单心智求解来建构制度，忽略了过程的能量消耗与无穷成本，忽略了本真的人的存在、演化的存在、多样性的存在、历史的存在，理性被完全建构；演化观则将理性诉诸无所不能的自然与自然选择，自然结构和功能超越个体，并将个体行为认做无意识或无作为，将人类社会演化视作自然选择下的普通生物演化，忽略了人类个体的认知而被整体生物化，理性被完全演化。本质上，完全构建理性与完全演化理性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同一关系，无所不能的个体选择等同于无所不能的自然选择并将其中的任一信条作为信仰，最终表现为均衡观与演化观趋于一致，两种范式均无法对现实的个体与经济社会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经济的复杂世界来源于现实观察所存在的多样性，而多样性的本质是使新事物的出现和生存成为可能，仅从学科隐喻的角度考虑，多样性的存在从统计学视角意味着小概率事件存在并发生，复杂科学视角意味着经济行为的分岔和混沌，生物学视角意味着社会存在突变并伴随选择，演化心理学视角意味着内含适应特性。社会经济的复杂本质反映出的特质是基于开放社会系统的复杂演化、不稳定和非均衡。因此，对于认知理性的产生和其本质的深刻性与调和性，表达了理性概念内涵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张力。

2. 动物精神

凯恩斯提出的动物精神，其代表了个体不具备逻辑理性并伴随非理性行

为的特质,产生原因普遍是由于行为个体的心智和情绪因素。凯恩斯认为,动物精神构成了非理性繁荣或崩溃的社会心理学基础。社会经济发展中针对个体的决策活动,除了进行理性计算并将其付诸决策使达成目标成为可能外,对于无法计算的预期状态,个体往往按照不具备理性基础的习俗或惯常做法进行决策。凯恩斯称:“关于结果要在许多天后才能见分晓的积极行动,我们的大多数决策很可能起源于动物精神——一种自发的而不是无所事事的冲动”^①。如果按照不符合认知理性的条件来看,由个体心智因素伴随产生的动物精神一般具有相对非稳定性和相对不可重复性,并且容易出现对待认知资源的非效率特性。在利用实验与行为经济学进行金融资产定价的国内研究方面如林树和俞乔(2010)从个体的动物精神引出投资者情绪的角度,由心理学实验入手获得了投资者行为及行为定价的心理学证据。

3. 对“内涵”的一个复杂性解释

本质上,投资者的动物理性忠诚包含的认知理性与动物精神体现并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复杂性的事实。但是,所谓的复杂性并不代表着事物之间关联的混杂无序,复杂的意义恰恰体现有序与组织、多样与统一。但目前被误解的复杂性,正如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说:“(大多数人认为)其(复杂性)只能表达我们的困惑与迷惘,我们无能地通过简单和明确的方法看待事物,以使思想变得有序。”^②而这恰是“科学”通过对现实认识的随意剪切和肢解使得仅能允许我们艰难地捕捉实在的复杂。发端于笛卡儿“被拆解为简单化”的还原主义精神,将思维主体与外延事物分离,同时,广泛抱有区分的概念使哲学的思维和科学的认识相互割裂,这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无情分离,目前学科的肆意离析和专业细化就是很好例证,在看似严谨的操作和碎片式的认识下,实则是将整体性与实在性进行了肢解,不再考虑个体的存在,或者无异于个体是不存在的。且不论自然科学的境地,试想,人类学科或人文学科脱离了人的本真性、忽略了个体的存在性,通过所认为的万能式的方法论给予复杂对象过度的抽象和简化,并以此镶嵌在封闭而非开放的境地中,其得到的所谓结论或存在的意义及价值如何(自然科学实则存在同样深刻的问题)?过度抽象和简化的代价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体现多样性这一本质,进而无法实现统一性。碎片似的知识和记忆对于莫兰所言:“在大众传媒产生着低级的愚昧化的时候,大学产生着高级的愚昧化……方法论的蒙昧主义……知识愈来愈不是产生出来被用来进行思考和讨论的,而是愈来愈用于被编码存放在信息存储器里,……,但是,这个新式的、巨大的和异常的无知本身,却为学者们所不知晓,……人类的问题交付

①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重印本,第165页。

② Edgar Morin, 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complexe, 前言,中译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给这种产生了一些极其无知的专门家的科学蒙昧主义……。”^①

社会经济的复杂世界来源于现实观察所存在的开放的多样性，而多样性的本质是使新事物的出现和生存成为可能，如果延续并从学科隐喻的角度考虑，多样性的存在从统计学视角意味着小概率事件存在并发生，复杂科学视角意味着经济行为的分岔和混沌，生物学视角意味着社会存在突变并伴随选择，演化心理学视角意味着内含适应特性。社会经济的复杂本质反映出的特质是基于开放社会系统的复杂演化、不稳定和非均衡。帕斯卡（Pascal）也曾有过经典的论述：“所有事物都既是结果也是原因，既是受动者也是主动者，既是被中介的又是直接存在的；所有事物都是彼此相关，自然的和难以察觉的联系把相距最远的和最不同的事物都联系起来。”

4. 基于方法论的思考

现状：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被碎片化的社会；而它确又是一个实在的整体；矛盾凸显，好似长久以来存在于哲学思考中的知识与智慧间的巨大鸿沟。

笛卡尔于1637年发表“*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the Reason and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这一堪称经典的论著中所描述的方法论之一即“分离与拆解”，一个充满还原主义的思想，其背后的核心即通过把“复杂”问题分解为“简单”问题随即逐个解决。此后三百余年，甚至直至今日，这一“线性式的方法”仍然支配着大量学科作为研究的主导范式。与此同时，知识被学科划分，科学认识逐渐脱离哲学思维，知识的碎片反而愈来愈成为一种带有“缺少‘感情’、缺少‘精神’、缺少‘价值’”的程式化工具，由彩色渐变为单色，知识实用主义铺天盖地。但是，另一些不得不面对的话题日益显现：所有的事物均可以拆解—还原吗？能否无限度地拆分并加总？知识的工具主义与本质主义同样意义重大吗？在发展变化的同时，作为信仰似的方法论会绝对的一成不变吗？而另外，相比于方法论的还原论而言，当然不是强调或凸显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优越性，诚然，整体论所无法避免的空虚或过度庞大是不可忽略的。于是作者认为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出现了：对于以往普遍的还原论与整体论之间水火不容似的对立态度是否能从更加开阔的视角实现一种斡旋？

这百余年间，在学科各自内部分化的张力中，他们间的交流日益减少，近数十年各个学科内部的细化与细部间的交流虽逐渐增多并形成了意识，数百年的进程中看起来依然解决了许多社会困扰和人类问题，但是，依旧无法摆脱碎片和暗淡的实在。分隔的、封闭的学科研究普遍存在，而这恰是受到

^① Edgar Morin, *Introduction à la pensée complexe*, pp. 6-7, 中译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